本版关注

以说话为桥梁 走进群众心中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说话水平是丈量领导干部综合素质、能力水平的一把尺子,也是拉近与群众距离的重要介质,了解情况、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化解矛盾、增进信任都离不开说话。只有掌握了说话的技巧,在依靠群众、服务群众、融入群众的基础上不断淬炼说话艺术,发挥语言的无穷力量,才能赢得群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近日,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领导干部怎么跟群众说话》就是一部有关"领导干部如何说话"的著作。新的社会环境下,领导干部需要在更多、更复杂的场合跟群众说话。比如在新媒体上与群众交流,在电视上接受采访,在群众遭遇公共突发事件时,来到群众当中讲话等。在这些场合讲话,不仅能直接体现出领导干部是否对群众有感情,是否把群众的事情放心上,对领导干部跟群众说话的能力也是一种直观的考验。这些场合下的讲话往往是即兴的,在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领导干部一旦没说好、说错话,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领导干部的不当言论不仅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政策措施的有效推行,甚至会引发舆论次生灾害,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该书就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经常需要跟群众说话的场合,提出了诸多跟群众说话的原则和要点,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掌握与人民群众说话的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郭)

《领导干部怎么跟群众说话》夏树、崔丽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10月版/25.00元

破解治理之道:从国家到世界

关键词 治国理政 制度建设 国家能力

没有强大的治理能力,再好的政治体制和治理体系也会失灵,要提升一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治理水平,在当下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不仅要有理论创新,还要注重方法论的创新。

主题书评

○罗 蒙(书评人)

中国的制度建设任重道远

自本世纪初以来,"国家能力"这个词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学者和媒体引用,此后逐渐为大众接受,以至于如今一提起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很多人自然就会联想到"提升国家能力"。在过去,由国人,尤其是国家领导人撰写的讨论这一主题的书籍似乎始终阙如,这虽不代表过去不重国家能力建设,但至少可以说大家都没能注重从理论上总结概括这一重要治国思路。而如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版)一书出版已有一段时间了,不仅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还对人们理解新一代执政者的理念和思路大有帮助。

2014年10月初,外文出版社在法兰克福书展举行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多语种全球首发式。迄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外文各版本发行已覆盖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30余万册,在海内外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影响。

不仅如此,从今年起,国内更有一系列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书籍出版。10月下旬,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光明日报智库等联合主办的新书发布会暨出版座谈会上,就有三种出版物亮相,分别是:**《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创新纪检监察体制,遏制一把手腐败》**,以及**《国家治理研究》**。社科界人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人均购买力计算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但制度建设仍任重道远,有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是其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有理论指导,而习近平的这部著作,既体现了其个人和整个执政党的执政思路,也是在处理上述问题时最为直接、有用的理论指导读物。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没有强大的治理能力,再好的政治体制和治理体系也会失灵。而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政治传统,恰好也始终是强调"致政",即通过合理有效的治国手段,使得国家得到治理,力争使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皆能达到富足水平,社会长治久安、和谐稳定。这个目标看似不高,其实真要做到却并非易事。因此,光靠过去年代经常强调的"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式的"苦干"显然远远不够,要提高提升一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治理水平,在当下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还要注重方法论的创新。这就需要治国者具有极其广阔的政治视野、极为敏锐的政治眼光、极端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不断创新的忧患意识。在具体做法上,则一方面需要借鉴东西方各国治理实践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还需要在"干中学"。而在此过程中,即使总结经验显然也是极其重要的,这本书就是对现阶段如何提升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回答。

国家治理出版物备受关注

正当中国国家元首兼执政党领导人著书论述治国理政之方针策略之时,外国的政界、学界和媒体也没闲着。近些年来,伴随着全球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持续关注和探讨,有关国家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如何提升治理能力的出版物层出不穷。其中,日裔美籍学者佛朗西斯·福山和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多本著作格外引人注目。

福山在其最近的著作**《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中,论述了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旧有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遭到严重冲击,犯罪率、离婚率、未婚生育率的大幅下降,社会信任度的明显降低的现象,提出了通过人类自身重建社会秩序的强大能力来克服此一消极趋势的建议,可谓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报。他的另一部重要新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则描述了国家、法治与民主负责制这三大制度在世界各地由于发展顺序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结果。该书讨论了政治腐败的治理,检视了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不同政治遗产,并预估了在未来世界,民主将如何应对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政治瘫痪。这部作品可谓有关国家治理能力主题的恢弘巨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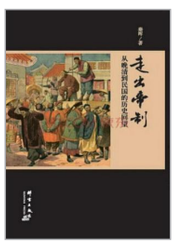
作为老牌政治家兼国际问题专家,亨利·基辛格以92岁高龄发表的最新力作**《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版),试图解读当今世界格局21世纪国际呈现出的新挑战,同样引起极大的反响,让人不能不感叹"姜还是老的辣"。同样是在今年,基辛格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他的处女作**《重建的世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10月版)中文本再版发行,这部看似很老的书,其实并不过时。在这部著作中,作者着重阐发了"均势外交"思想,即,世界政治的格局不应由两极或单一的某一极力量决定,而应将世界各国,尤其是各主要大国的利益和诉求考虑在内。正是这本书奠定了基辛格战略思维的基础,也使得作者得以跻身于现实主义学派中第一流学者之列。

在国际间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不仅国家领导人重视国家发展方略的制定和执行,国内从学界到出版界,乃至于许多普通读者,作为时代的一分子,也都十分关注这一既关系到民族前途与命运,又与每个人的未来生活休戚相关的重要话题。毕竟大家都意识到,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尽管有关国家治理的话题听起来离普通人是那么遥远,在这个早已被称为地球村的世界上,其实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而前几天刚刚发生的惨烈无比的巴黎爆炸案,更是证明了国家治理的好坏必然会影响到每个个体的最终福祉。

的确,只要人类存在,关于一国乃至全球治理之道的话题,也许就会一代又一代,永无止境地被讨论下去。此一问题,总是如此折磨人,却又让人一谈起来就欲罢不能——在中国,则更是极少数"老少咸宜"的话题之一。对于国人而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阅读西人作品,情不自禁想到的,恐怕仍是脚下的这片土地。布衣尚且如此,治国者岂能不在念兹在兹?

● 书与人

秦晖



《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群言出版社,2015年10月版)是著名学者秦晖有关近代史方面的文章结集。2011年时逢辛亥百年,作者应报章之邀开设专栏,就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许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2014年"一战"百年、2015年新文化运动百年,秦晖又写了些相关文字。这期间还对太平天国与近代中日关系也发表过意见。所有这些看法其实都来自多年以来秦晖对近现代史的一个宏观构想,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走出帝制,走向共和"?如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何以发生?秦晖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抓住了这一头一尾的两大变局——形成我们过去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与历时百余年我们至今仍身历其中的"晚清以来之变",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并看到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了。

刘小枫

《王有所成:习读柏拉图札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是著名学者刘小枫的最新著作,综汇作者多年习读柏拉图之体悟。书中收入刘小枫晚近几年所作数篇习读柏拉图的札记,是其在施特劳斯讲课稿的指引下阅读柏拉图的阅读心得。刘小枫重新识读了柏拉图的数篇希腊文原典,在亲自重译的基础上,对思想史上的一些经典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理解,重点涉及的篇章包括《克力同》《理想国》《会饮》《普罗塔戈拉》等。

裴士锋

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所产生的改革者、军官、革命家之多,居中国诸省之冠,但史学研究却鲜少对湖南进行连贯性的探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是学术品牌甲骨文继《天国之秋》后出版的又一部美国学者裴士锋的史学力作。全书以湖南为中心,作者以令人信服的笔法说明地方根源与民族果实的关系。裴士锋笔下的湖南以新且有效的方式说明了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认为湖南在内部进行的思想改革与论述,牵动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卜正民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版)是加拿大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最新著作。作者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并分析地方头面人物与日伪政府的关系交织。"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借助对这种模糊行为的分析,作者考察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以求揭示一个复杂的战时社会。

信仰危机的历史教训

关键词 信仰危机 民族精神 党风建设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旦出现危机,不加以及时整肃,只能越陷越深。

知史论世

○芦苇秋深(书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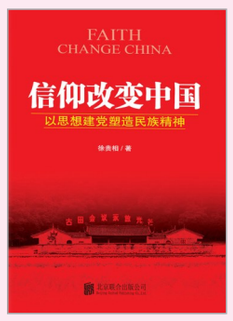
崇祯十七年三月,在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斗争下,京师陷落,崇祯帝朱由检在穷途末路之下,自缢煤山,宣告了大明王朝的结束。京师陷落的消息很快传到南京。在各组派系的"权衡游戏"后,五月,奉迎弘光帝朱由崧继承大统,为光复"大明"树立旗帜。南明就这样登上历史舞台,踏上近20年的风雨飘零之路。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满洲八旗并未占得绝对优势。即使在大明陷落后,南方的各种后援物资等,也比清朝充足。而且,清朝已经攻陷的后方也并不稳定,例如山西就有大量的遗民在策反,张煌言、钱谦益在江南策反,金声桓在江西投诚。另外,南方幅员辽阔,地理上有优势,有利于纵深抵御。又有海上作战经验,退可守,进可攻。桂林大捷、衡阳大捷、郑成功北伐前期等胜利就可证明。

那么,南明何以不敌清军,转瞬间,落日残烟。上演了一幕"山河破碎风飘絮"的王朝悲歌?让后人读到南明史,不禁想起"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从前人的分析解读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南明的覆亡,根源不在于外,而来自内部的信仰危机。

其实,在明代中后期,广大士大夫和社会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已经出现信仰危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旦出现危机,不加以整肃,只能越陷越深。从跟随王朝覆灭而殉道的士大夫人数就可以看出,甚至从崇祯开始筹集军饷时就可以看出。崇祯一死,绝对权威荡然无存。



《信仰改变中国:以思想建党塑造民族精神》徐贵相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11月版/38.00元

由于信仰危机而造成不可挽救的覆亡败局的故事太多了,近现代的大清王朝、蒋家王朝等等,无一不是如此。

90余年前,南北十数人怀着布尔什维克的崇高理想,以坚定的信念在黑暗时代投入救国救民的行阵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开始由十几个人,迅速扩展到数万、数十万、数百万……中国共产党员和他们的支持者遍布全中国的每一处角落。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实现挽救民族于水火、人民解放的信念,不管敌人的武器多么先进、拷掠多么痛苦,死咬牙关,永不叛变。也正是凭着这种信念,不管前方多么黑暗、道路多么曲折、打击多么残酷,走赤水、穿雪山、反侵略、反内战、反破坏,终于成长成一支强大、勇敢、服从党指挥,为人民服务的无坚不摧的队伍。正是因为他们,新中国才得以成立,继以繁荣昌盛,中国人的脊梁才在世界面前挺立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全国上下又投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中,焦裕禄、王进喜、雷锋、王伟等等,成为我们心中的英雄。同时,居安思危,国家极其重视党风建设,整风整纪,保持党员的纯洁性、先进性,粉碎高岗、林彪等阴谋计划,反对四人帮等结派组织。所有的这些,都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奠定基础。国家繁荣昌盛了,鱼水之情也就更和谐融洽。只有社会和谐了,信仰才不会出现危机,反过来也是如此。

一败一成之间,可见凝聚、建立信仰体系对国家的兴亡影响深远。《信仰改变中国》一书,其意义正在于此。

"做官要学曾国藩"之镜思

关键词 曾国藩 为官 担当

围绕"权力"与"修养"这两个重大问题,作者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迷雾,从为师为将为相到治国治家治身,系统阐述了曾国藩一生的意义在培养人才与陶铸世风。

他山之石

○叶 雷(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复杂的人物,长期以来的评价两极,赞者把他当作圣人顶礼膜拜,责者骂他是刽子手、卖国贼。当然,我们最熟悉的还是那句"做官要学曾国藩"。就如刘绪义教授在其新著《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中说的一样:"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和普通镜子的不同之处在于:镜子只能照出人的表面,而历史能照出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心灵"。现代意义上"做官要学曾国藩",显然不是定位于权术,否则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也不会将该书列为推荐书目了。那么,"做官要学曾国藩",在历史之镜下,究竟要学什么?怎么学?

名臣能吏,中兴将相,育子楷模,死后"五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做官要学曾国藩",当然没错。"知人以论世",作者在该书中不是为了评曾国藩,而是把曾国藩置于晚清大变局当中,以历史之镜的姿态,来探讨"做官要学曾国藩"的现代意义,并对升官发财的"权术"视野正本清源。所以,自序"当官好比做慈善"开宗明义,只有跳出升官发财"权术"的樊篱,官员才能像曾国藩一样,走出个人的小天地,走进历史的大视野,将自己和历史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重新解读晚清危局中社会精英的责任与使命》刘绪义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10月版/39.80元

学习与实践是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内在推力。曾国藩的好学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在王朝体制内的考试不断进步,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不断广搜博取,更是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关于学习与实践,曾国藩有"四字三喻"的方法流传至今,"四字"即看、读、写、作,"三喻"则是以经商、打仗、得失来喻"看"与"读"的关系,"看"就好比做行商,"读"就好比守财,"看"好比攻城略地,"读"就好比守住地盘,"看"就是日有所知,"读"就是月不能忘。

回到如今的问题官员,总会将理想信念置于首位,在剖析思想根源的时候,则基本千篇一律,不学习,不改造世界观。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历经学习、探求、证伪而来,可谓"看";通过读经典著作、宣誓来巩固信仰,可谓"读";宣传标语、自查报告以不断校正,可谓"写";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可谓"作"。曾国藩治学的现代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没有看、读、写、作,何来"改造世界观"?所谓的"世界眼光"、"中国情怀"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湘军为什么多读书人?当然与曾国藩的"率先为范"不无关系,现在的领导干部不应该学习吗?

曾国藩中了进士,也只不过是翰林院的一词臣;面对太平天国,他不过一介书生;即使十年征衣期间,也是要实权七年不得,兵靠自己招,钱靠自己筹。曾国藩何以成就了历史呢?刘绪义教授将其总结为"担当"二字,并通过详细论证指出,"曾国藩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他绝大部分精力并不是花在战争中,而是花在与世俗文法斗、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斗。"现在党员、干部,确有不少是庸官、不作为的官、不敢不想担当的官。"做官要学曾国藩",其实不妨重温一下曾国藩的名言,"未来不迎,当时不杂,过往不恋";"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当然,曾国藩也并不是没有缺陷,"做官要学曾国藩",也有许多需要扬弃的地方。比如,曾国藩不仅是非典型清官,因为他也收礼,而且还行贿,同治七年调任直隶总督为了笼络京官就散了2万两银子。但就如评价曾国藩,应该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分析评价他。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曾国藩不得不明哲保身:"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而这,恰恰突出了当今建构制度、执行制度以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否则不仅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即使如曾国藩这般自爱自洁的"良币",也难免被玷污。